

- ☒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 ☐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郭店楚墓竹簡儒家類古籍研究」

專題研究計畫 (NSC89-H-002-010) 成果報告

臺灣大學 ^{周鳳五}

一九九三年冬，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出土竹簡七百多枚，內容包括《緇衣》、《五行》、《老子》、《太一生水》等先秦儒、道兩家的典籍與前所未見的古佚書共十六種十八篇¹，經整理後，由文物出版社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郭店楚墓竹簡》。在汲冢竹書出土一千七百年之後，²我們得以目睹珍貴的先秦古文竹書，真可謂眼福不淺。

這批竹簡最長的為 32.5 公分，簡端修整為梯形，包括《緇衣》、《五行》、《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尊德義》、《六德》六篇，其中《性自命出》以下四篇都是兩道編線，間距 17.5 公分，明顯屬於同一類；《緇衣》與《五行》也是兩道編線，前者間距 12.8—13 公分，後者 12.9—13 公分，也可以歸為一類，這兩篇相傳出自子思之手，在儒家子思學派享有經典的地位。³準此以推，與之簡長相同、思想相應的《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尊德義》、《六德》等四篇，似乎也可以歸入經典之列。

簡端修整為梯形的還有《魯穆公問子思》與《窮達以時》，前者記述子思與魯穆公的問答，突顯了子思正直不阿的人格；後者強調君子不以窮達易節，為儒家一貫的立身之道。兩篇的內容都與子思的生平、思想相應，當屬子思學派有關宗師的嘉言懿行的記錄與闡述，估計出於子思的弟子或後學之手，其重要性較前述子思手著的各篇似乎略遜一籌。兩篇的簡長只有 26.4 公分，也清楚反映了這個事實。不過，《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緇衣》、《五行》、《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尊德義》、《六德》等八篇的寫作，直接或間接都與子思有關，內容也都是

¹ 《五行》雖然也屬古佚書，但一九七三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已經出土西漢帛書本，郭店竹簡是第二次發現。《五行》兩次出土都伴隨著《老子》，具體反映了戰國中晚期至西漢初年儒、道兩家學術思想糅合形成雜家的歷程。

² 汲冢竹書出土的年代，有咸寧五年、太康元年、太康二年三說。按，此三年前後銜接，即公元二七九年至二八一年，距今已一千七百餘年。

³ 《隋書·音樂志》引沈約說：「《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可見《緇衣》為子思所作。《荀子·非十二子》說：「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可見《五行》為子思所作。參考龐樸《帛書五行篇研究》，濟南，齊魯書社，一九八零年七月。

子思的生平及學術思想的記錄與闡述。考慮先秦諸子的成書，多由一派宗師首開其端，繼而弟子門人轉相傳習，最後歷經眾手而寫定；其內容則舉凡宗師的學術思想、嘉言宏論、遺聞軼事以及後學傳習者的詮釋、闡發，幾乎無所不包。⁴則上述八篇似可彙編為一書，而且很可能就是流傳於先秦，自北宋以後日漸散佚的儒家典籍《子思子》。換句話說，梯形簡端在郭店竹簡之中，是子思學派經典的主要形式特徵，這一類在郭店竹簡之中最為重要。

另外，與儒家思想相關還有《忠信之道》與《唐虞之道》，前者簡長 28.2—28.3 公分，後者 28.1—28.3 公分，可以視為等長；簡端修整平齊，不作梯形。我曾經撰文指出，《忠信之道》是對《論語·衛靈公》所載孔子「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一語的闡述；⁵《唐虞之道》則是孟子學派的學者，很可能就是孟子本人，對於儒家「禪讓」之說的詮釋，具體的時代背景則是燕王噲禪位予相國子之，導致連年內亂，齊宣王遂聯合趙、中山出兵伐燕一事。⁶考慮郭店竹簡儒家類各篇的內容與孟子思想同中有異，⁷且孟子曾「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則郭店竹簡的

⁴ 參考張心激《偽書通考》，台北，鼎文書局，一九七三年十月。

⁵ 周鳳五《郭店楚簡忠信之道考釋》，《中國文字》新廿四期，台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現在我更進一步認為，《忠信之道》出於戰國中期的儒家學者之手。《論語》在郭店一號楚墓墓主生前應已成書，而且已經向四方傳播，如《語叢三》第五零簡、第五一簡：「志於道，狎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又第六四簡：「毋意，毋固，毋我，毋必。」又第九簡至第一六簡有關益友、損友的討論等都見於今本《論語》，就是確鑿的證明。

⁶ 《孟子》書中曾經屢次討論燕國的禪讓，而孟子本人於齊宣王伐燕一事則涉入頗深。參考周鳳五《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新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本第三分。

⁷ 郭店竹簡的思想與《孟子》有同有異，如《語叢一》第九八簡：「喪，仁之耑也。」《語叢三》第二三簡：「□，□之耑也。」耑，讀作端，這兩句的用語與內容似與《孟子》所標榜的「擴充四端」有關。但《六德》第二六簡：「仁，內也；義，外也；禮、樂，共也。」《語叢一》第一九簡至第二三簡：「由中出者，仁、忠、信；由外入者，聖、智、義。或生於內，或生於外。」（按，上引《語叢一》「外入者，聖、智、義。」六字原缺，據上下文意並參考《六德》補。）這種「仁內義外」的說法，是由子思「五行」之說推演而來的，《六德》對此也頗有闡發。但孟子並不贊同此說，《孟子·告子下》有兩處明白反駁「仁內義外」的記載。參考焦循《孟子正義》頁四三七至頁四四零，台北，世界書局。「仁內義外」之說在當時似乎頗為流行，如《管子·戒》：「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這應當是稷下儒家之言，也是當時「天下之通義」，孟子既然附和子思所倡導的「五行」，則其早年亦必服膺「仁內義外」之說無疑。至於「擴充四端」云云，則應當是孟子思想後來進一步的發展了。

主體當屬子思一系，不宜籠統稱為「思孟學派」。因此，孟子所作或與孟子相關的思想言論，在竹簡中歸入傳注而非尊為經典亦屬理所當然。這兩篇保留較多齊國文字的特徵，正是一個有力的旁證。⁸

郭店竹簡儒家類古籍之中，內容最費解，性質最難定的就是《語叢》四篇。《語叢四》竹簡二十七枚，簡長與《語叢二》同為 15.1—15.2 公分，這是郭店竹簡最短的兩種。但《語叢二》每簡最多抄寫八個字，與簡長 17.2—17.4 公分的《語叢一》、簡長 17.6—17.7 公分的《語叢三》相同，⁹字與字的間距較大，行款顯得寬綽，為郭店竹簡其餘各類所未見。

《語叢四》則每簡最多可達十五、六字，為《語叢》類其他三種的一倍，間距小而行款緊密。郭店竹簡除《忠信之道》與甲組《老子》每簡抄寫三十字左右之外，其餘各篇都在二十至二十五字之間。《語叢四》竹簡較短，每簡平均抄寫十五字，若依簡長與字數的比率計算，每簡大約抄寫二十五至三十字。換句話說，《語叢四》的簡長同於《語叢》類，行款卻明顯有別於《語叢》類其餘三種，而與郭店竹簡的其餘各類相同。就內容來說，《語叢四》字裡行間充斥著口舌權變之術，具有鮮明的戰國縱橫家的色彩，與儒家全無關係，這裡暫不討論。

至於《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的學術流派，可以根據字體略窺其端倪。這三篇的文字，結體較長，筆畫較均勻，應可歸入「篆書」之列。¹⁰類似的字體又見於《包山楚簡》的《集書》、《集書言》、《受期》等簡的標題，都是結體較長，筆畫均勻，具有篆書的特徵。¹¹估計當時選擇字體有其書寫的內容、性質及應用場合的考慮，青銅器銘文多半典雅端正，竹簡標題的字體也比較規整。

值得注意的是，《儀禮正義》引東漢服虔《左傳注》載服虔所見的古本《左傳》是「古文篆書，一簡八字。」¹²而《語叢一》、《語叢二》、《語

⁸ 這兩篇的字形、書法風格與郭店儒家各篇有顯著的不同，若干文字如者、孝、治等，帶有齊國的特徵，估計其傳抄流布於楚國的年代上距其寫作應當不遠，所以文字尚未被楚國的儒家學者所「馴化」(Domestication)。參考周鳳五《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新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本第三分。

⁹ 也有一簡不止抄寫八個字的，但為數甚少，應屬例外。

¹⁰ 《說文解字》五上：「篆，引書也。」段注：「引書者，引筆而著於竹帛也。」按，引書當指筆畫引曳而長，段說非是。

¹¹ 《集書》見《包山楚簡》第一簡，《集書言》見第十四簡，《受期》見第三三簡反。

¹² 《十三經注疏》四，《儀禮正義》頁二八三，「一簡八字」原作「一簡八分字」，據

叢三》不但筆畫引曳伸長、線條粗細均勻，具有「篆書」的基本特徵，¹³而且正好也是每簡最多抄寫八個字，除了少數例外。如《語叢一》一百十二枚竹簡之中，只有第六五簡抄寫九個字；《語叢二》五十二枚竹簡之中，只有第四五簡抄寫九個字。細察這兩枚竹簡，可以發現其下端第八、第九兩字的間距都比較小，似乎原來抄脫一個字，事後加以補寫的。¹⁴由此可見，《語叢一》與《語叢二》完全符合服虔「古文篆書，一簡八字」的敘述。至於《語叢三》的七十二枚竹簡之中，每簡溢出八個字的，計有第一簡、第二簡、第三簡（以上每簡十字），第四簡、第六簡、第十三簡、第十九簡、第二十簡（以上每簡九字），第四八簡（十字），除了第十三簡之外，其餘八枚溢出的字都與補字無關。不過，《語叢》類三篇總計竹簡二百三十六枚，真正一簡溢出八個字的只有八枚，不到百分之三點四，比率不算太高，不妨視為例外，而且這個現象集中在《語叢三》，更可以視為單純的個案。換句話說，《語叢三》的抄寫者沒有嚴格遵守「一簡八字」的規律。整體看來，服虔所說的「古文篆書，一簡八字」的體例，在《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之中應當是存在的。

根據前述服虔的說法，郭店竹簡這一類字體可以逕稱為「古文篆書」，或者沿襲《說文解字·敘》稱之為「古文」亦無不可。¹⁵應當指出，服虔生當東漢，「古文經」早已流行，服虔不容不知。他之所以不逕稱為「古文」而必以「古文篆書」為名，當是有鑑於古本《左傳》的字體線條均勻，筆畫引曳，類似今日所見的《語叢》類三篇。這種字體結構謹嚴，典雅整飭，保留篆書「引而申之」的意味，符合經典文字作為「規矩模範」的要求，應當就是先秦時代儒家典籍常用以抄寫的標準字體；如果下筆速度稍快，不避「釘頭」、「鼠尾」，造成「頭臃尾細」的線條，

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改。

¹³《說文解字》五上：「篆，引書也。」段注：「引書者，引筆而箸於竹帛也。」按，引書當指引曳筆畫而書。

¹⁴由各字的間距與字形的大小可以判斷其抄寫的先後，《語叢一》第六五簡：「上下皆得其所之謂信」的「謂信」二字緊接而「信」字較小，顯然「信」字是補寫的；《語叢二》第四五簡：「未有善事人而不返者」的「返者」二字緊接而「者」字較小，「者」字顯然也是後來補寫的。

¹⁵《晉書·武帝紀》載汲冢竹書的字體也說是「古文篆書」，但今本《晉書》出於唐人之手，當時篆書已非日常實用的字體，所謂「古文篆書」云云，重點只在「古文」，至於「篆書」二字當是「連類及之」。

就是兩漢魏晉人所說的「科斗文」；若再參雜「鳥蟲書」筆意，形成「豐中首尾銳」的筆畫，則為《魏三體石經》「古文」一體之所從出了。《左傳》自先秦以訖西漢晚期湮而未彰，傳習者不多，未經輾轉抄寫，有幸保存先秦古抄本的原始面貌，而為東漢服虔所摩挲目驗；「古文篆書」一語正透露出個中消息。

服虔當年所見既是《左傳》的先秦古抄本，我們還應當注意，即無論《左傳》是否依傍《春秋》，是否原名《左氏春秋》，就先秦儒家典籍的分類而言，《春秋》為經典、《左傳》為傳注乃是不爭的事實。《語叢》類三篇的形式特徵既然與《左傳》的先秦古抄本完全吻合，則《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也當如《左傳》一般，屬於儒家典籍的「傳注」類。就簡長來說，這三篇最短，合於兩漢學者所述儒家典籍以簡長區分經、傳的標準；就篇章結構來說，這三篇片段成文，自為起訖，前後不相連屬而各有所指，正符合先秦時代傳注別出單行的體例；就內容來說，這三篇針對出現於《五行》等篇的若干語詞加以解釋或闡發，用語雷同，思想一致，顯然就是《五行》、《性自命出》等篇的注解。¹⁶總之，綜觀形式與內容，《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應當就是子思學派的後學所記錄的師說。其中引述《論語》的話，年代似乎較早，可能是「子思之言，而門人記之」；至於「擴充四端」的相關字句，估計出於孟子之後，為孟子的弟子所記。這批先秦儒家的經典與注解，隨著儒學的南傳來到了楚國，這也就是郭店竹簡儒家類古書年代的下限。

此外，還應當指出，《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有若干簡文的字體與楚國相去較遠。如果採取宏觀的角度，對照戰國青銅器銘文，如齊國的《陳曼簠》、《陳純釜》，三晉的《吉日壬午劍》、《魚鼎匕》，中山國的《中山王錯鼎》、《中山王錯壺》等，並與《魏三體石經》的「古文」相比較，我們可以說，《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具有齊、三晉、中山等國文字的特徵，而這一帶正是戰國儒家思想盛行的區域。《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自外地輾轉傳入楚國，簡文保存若干齊、魯

¹⁶ 例如《語叢一》第六八簡：「察天道以化民氣。」、第八四簡：「有察善，無為善。」、第八五簡：「察所知，察所不知。」、第八六簡：「勢與聲為可察也。」都是《五行》第八簡：「思不清不察」的「察」字的注解。

儒家經典的特色是可以理解的。這不但具體反映先秦時代儒家思想自齊、魯向四方傳播的過程，也客觀呈現了楚國與各國學術交流的實況。¹⁷尤其《語叢三》第二十四簡以下，筆勢圓轉流暢，筆觸輕重變化顯著，與《魏三體石經》的「古文」最覺神似；且其中屢次出現的「者」字完全不同於楚國以及三晉的形體結構，而與齊國文字一脈相承，其訛變、遞嬗之跡斑斑可考。¹⁸凡此均足以證明，這一類的字體保存了較多齊、魯儒家經典文字的特色。

《唐虞之道》與《忠信之道》的字體也值得注意。這兩篇簡文筆畫較肥，「豐中首尾銳」或「頭粗尾細」的特徵更為顯著，其中「仁」、「而」、「皇」、「情」、「皆」、「用」、「甚」、「者」等字的結構具有齊國文字的特徵，與楚國簡帛文字的風格迥然有別。估計其底本出自齊國儒家學者之手，傳入楚國為時不久，未經輾轉傳抄，保留較多的齊國文字的原貌。

總結的說，郭店竹簡儒家類古籍以子思的學說為主，雜有孟子之學的色彩，是先秦儒家由子思遞傳至孟子的第一手資料。本文指出經典與傳注之分，不但勾勒出儒家經典的成立與傳注形成的過程，更明白呈現孟子對子思之學的繼承、發展與改變。

¹⁷ 儒家典籍在流布的過程中不斷被傳習者輾轉抄寫，而時空的遷移也在文本烙下清晰的印痕。尤其楚國為南方之強，其語言、文化自成一系，不但與中原各國爭霸，甚至問鼎周室，儼然與天子分庭抗禮。這樣一個南方的大國，自國外引進學術思想，在傳抄外來典籍的過程中，勢必經歷文字「馴化」(Domestication)的階段。較早傳入的典籍，其字體早已「居楚則楚」，被楚國文字所馴化；至於新近傳入或罕為人知的文本，則往往保留若干外來文字的蛛絲馬跡。

¹⁸ 「者」字見於第二十六簡、第二十八簡、第三十簡。這種寫法是齊國文字的訛變，《陳純釜》銘文可以參看。另外，「於」、「親」等字則近似中山國器銘，而與楚簡常見的字體有別。

「郭店楚墓竹簡儒家類古籍研究」
專題研究計畫 (NSC89-H-002-010) 成果報告

臺灣大學 周鳳五

一九九三年冬，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出土竹簡七百多枚，內容包括《緇衣》、《五行》、《老子》、《太一生水》等先秦儒、道兩家的典籍與前所未見的古佚書共十六種十八篇¹，經整理後，由文物出版社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郭店楚墓竹簡》。在汲冢竹書出土一千七百年之後，²我們得以目睹珍貴的先秦古文竹書，真可謂眼福不淺。

這批竹簡最長的為 32.5 公分，簡端修整為梯形，包括《緇衣》、《五行》、《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尊德義》、《六德》六篇，其中《性自命出》以下四篇都是兩道編線，間距 17.5 公分，明顯屬於同一類；《緇衣》與《五行》也是兩道編線，前者間距 12.8—13 公分，後者 12.9—13 公分，也可以歸為一類，這兩篇相傳出自子思之手，在儒家子思學派享有經典的地位。³準此以推，與之簡長相同、思想相應的《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尊德義》、《六德》等四篇，似乎也可以歸入經典之列。

簡端修整為梯形的還有《魯穆公問子思》與《窮達以時》，前者記述子思與魯穆公的問答，突顯了子思正直不阿的人格；後者強調君子不以窮達易節，為儒家一貫的立身之道。兩篇的內容都與子思的生平、思想相應，當屬子思學派有關宗師的嘉言懿行的記錄與闡述，估計出於子思的弟子或後學之手，其重要性較前述子思手著的各篇似乎略遜一籌。兩篇的簡長只有 26.4 公分，也清楚反映了這個事實。不過，《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緇衣》、《五行》、《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尊德義》、《六德》等八篇的寫作，直接或間接都與子思有關，內容也都是

¹ 《五行》雖然也屬古佚書，但一九七三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已經出土西漢帛書本，郭店竹簡是第二次發現。《五行》兩次出土都伴隨著《老子》，具體反映了戰國中晚期至西漢初年儒、道兩家學術思想糅合形成雜家的歷程。

² 汲冢竹書出土的年代，有咸寧五年、太康元年、太康二年三說。按，此三年前後銜接，即公元二七九年至二八一年，距今已一千七百餘年。

³ 《隋書·音樂志》引沈約說：「《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可見《緇衣》為子思所作。《荀子·非十二子》說：「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可見《五行》為子思所作。參考龐樸《帛書五行篇研究》，濟南，齊魯書社，一九八零年七月。

子思的生平及學術思想的記錄與闡述。考慮先秦諸子的成書，多由一派宗師首開其端，繼而弟子門人轉相傳習，最後歷經眾手而寫定；其內容則舉凡宗師的學術思想、嘉言宏論、遺聞軼事以及後學傳習者的詮釋、闡發，幾乎無所不包。⁴則上述八篇似可彙編為一書，而且很可能就是流傳於先秦，自北宋以後日漸散佚的儒家典籍《子思子》。換句話說，梯形簡端在郭店竹簡之中，是子思學派經典的主要形式特徵，這一類在郭店竹簡之中最為重要。

另外，與儒家思想相關還有《忠信之道》與《唐虞之道》，前者簡長 28.2—28.3 公分，後者 28.1—28.3 公分，可以視為等長；簡端修整平齊，不作梯形。我曾經撰文指出，《忠信之道》是對《論語·衛靈公》所載孔子「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一語的闡述；⁵《唐虞之道》則是孟子學派的學者，很可能就是孟子本人，對於儒家「禪讓」之說的詮釋，具體的時代背景則是燕王噲禪位予相國子之，導致連年內亂，齊宣王遂聯合趙、中山出兵伐燕一事。⁶考慮郭店竹簡儒家類各篇的內容與孟子思想同中有異，⁷且孟子曾「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則郭店竹簡的

⁴ 參考張心激《偽書通考》，台北，鼎文書局，一九七三年十月。

⁵ 周鳳五《郭店楚簡忠信之道考釋》，《中國文字》新廿四期，台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現在我更進一步認為，《忠信之道》出於戰國中期的儒家學者之手。《論語》在郭店一號楚墓墓主生前應已成書，而且已經向四方傳播，如《語叢三》第五零簡、第五一簡：「志於道，狎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又第六四簡：「毋意，毋固，毋我，毋必。」又第九簡至第一六簡有關益友、損友的討論等都見於今本《論語》，就是確鑿的證明。

⁶ 《孟子》書中曾經屢次討論燕國的禪讓，而孟子本人於齊宣王伐燕一事則涉入頗深。參考周鳳五《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新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本第三分。

⁷ 郭店竹簡的思想與《孟子》有同有異，如《語叢一》第九八簡：「喪，仁之耑也。」《語叢三》第二三簡：「□，□之耑也。」耑，讀作端，這兩句的用語與內容似與《孟子》所標榜的「擴充四端」有關。但《六德》第二六簡：「仁，內也；義，外也；禮、樂，共也。」《語叢一》第一九簡至第二三簡：「由中出者，仁、忠、信；由外入者，聖、智、義。或生於內，或生於外。」（按，上引《語叢一》「外入者，聖、智、義。」六字原缺，據上下文意並參考《六德》補。）這種「仁內義外」的說法，是由子思「五行」之說推演而來的，《六德》對此也頗有闡發。但孟子並不贊同此說，《孟子·告子下》有兩處明白反駁「仁內義外」的記載。參考焦循《孟子正義》頁四三七至頁四四零，台北，世界書局。「仁內義外」之說在當時似乎頗為流行，如《管子·戒》：「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這應當是稷下儒家之言，也是當時「天下之通義」，孟子既然附和子思所倡導的「五行」，則其早年亦必服膺「仁內義外」之說無疑。至於「擴充四端」云云，則應當是孟子思想後來進一步的發展了。

主體當屬子思一系，不宜籠統稱為「思孟學派」。因此，孟子所作或與孟子相關的思想言論，在竹簡中歸入傳注而非尊為經典亦屬理所當然。這兩篇保留較多齊國文字的特徵，正是一個有力的旁證。⁸

郭店竹簡儒家類古籍之中，內容最費解，性質最難定的就是《語叢》四篇。《語叢四》竹簡二十七枚，簡長與《語叢二》同為 15.1—15.2 公分，這是郭店竹簡最短的兩種。但《語叢二》每簡最多抄寫八個字，與簡長 17.2—17.4 公分的《語叢一》、簡長 17.6—17.7 公分的《語叢三》相同，⁹字與字的間距較大，行款顯得寬綽，為郭店竹簡其餘各類所未見。《語叢四》則每簡最多可達十五、六字，為《語叢》類其他三種的一倍，間距小而行款緊密。郭店竹簡除《忠信之道》與甲組《老子》每簡抄寫三十字左右之外，其餘各篇都在二十至二十五字之間。《語叢四》竹簡較短，每簡平均抄寫十五字，若依簡長與字數的比率計算，每簡大約抄寫二十五至三十字。換句話說，《語叢四》的簡長同於《語叢》類，行款卻明顯有別於《語叢》類其餘三種，而與郭店竹簡的其餘各類相同。就內容來說，《語叢四》字裡行間充斥著口舌權變之術，具有鮮明的戰國縱橫家的色彩，與儒家全無關係，這裡暫不討論。

至於《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的學術流派，可以根據字體略窺其端倪。這三篇的文字，結體較長，筆畫較均勻，應可歸入「篆書」之列。¹⁰類似的字體又見於《包山楚簡》的《集書》、《集書言》、《受期》等簡的標題，都是結體較長，筆畫均勻，具有篆書的特徵。¹¹估計當時選擇字體有其書寫的內容、性質及應用場合的考慮，青銅器銘文多半典雅端正，竹簡標題的字體也比較規整。

值得注意的是，《儀禮正義》引東漢服虔《左傳注》載服虔所見的古本《左傳》是「古文篆書，一簡八字。」¹²而《語叢一》、《語叢二》、《語

⁸ 這兩篇的字形、書法風格與郭店儒家各篇有顯著的不同，若干文字如者、孝、治等，帶有齊國的特徵，估計其傳抄流布於楚國的年代上距其寫作應當不遠，所以文字尚未被楚國的儒家學者所「馴化」(Domestication)。參考周鳳五《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新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本第三分。

⁹ 也有一簡不止抄寫八個字的，但為數甚少，應屬例外。

¹⁰ 《說文解字》五上：「篆，引書也。」段注：「引書者，引筆而箸於竹帛也也。」按，引書當指筆畫引曳而長，段說非是。

¹¹ 《集書》見《包山楚簡》第一簡，《集書言》見第十四簡，《受期》見第三三簡反。

¹² 《十三經注疏》四，《儀禮正義》頁二八三，「一簡八字」原作「一簡八分字」，據

叢三》不但筆畫引曳伸長、線條粗細均勻，具有「篆書」的基本特徵，¹³而且正好也是每簡最多抄寫八個字，除了少數例外。如《語叢一》一百十二枚竹簡之中，只有第六五簡抄寫九個字；《語叢二》五十二枚竹簡之中，只有第四五簡抄寫九個字。細察這兩枚竹簡，可以發現其下端第八、第九兩字的間距都比較小，似乎原來抄脫一個字，事後加以補寫的。¹⁴由此可見，《語叢一》與《語叢二》完全符合服虔「古文篆書，一簡八字」的敘述。至於《語叢三》的七十二枚竹簡之中，每簡溢出八個字的，計有第一簡、第二簡、第三簡（以上每簡十字），第四簡、第六簡、第十三簡、第十九簡、第二十簡（以上每簡九字），第四八簡（十字），除了第十三簡之外，其餘八枚溢出的字都與補字無關。不過，《語叢》類三篇總計竹簡二百三十六枚，真正一簡溢出八個字的只有八枚，不到百分之三點四，比率不算太高，不妨視為例外，而且這個現象集中在《語叢三》，更可以視為單純的個案。換句話說，《語叢三》的抄寫者沒有嚴格遵守「一簡八字」的規律。整體看來，服虔所說的「古文篆書，一簡八字」的體例，在《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之中應當是存在的。

根據前述服虔的說法，郭店竹簡這一類字體可以逕稱為「古文篆書」，或者沿襲《說文解字·敘》稱之為「古文」亦無不可。¹⁵應當指出，服虔生當東漢，「古文經」早已流行，服虔不容不知。他之所以不逕稱為「古文」而必以「古文篆書」為名，當是有鑑於古本《左傳》的字體線條均勻，筆畫引曳，類似今日所見的《語叢》類三篇。這種字體結構謹嚴，典雅整飭，保留篆書「引而申之」的意味，符合經典文字作為「規矩模範」的要求，應當就是先秦時代儒家典籍常用以抄寫的標準字體；如果下筆速度稍快，不避「釘頭」、「鼠尾」，造成「頭龐尾細」的線條，

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改。

¹³《說文解字》五上：「篆，引書也。」段注：「引書者，引筆而箸於竹帛也也。」按，引書當指引曳筆畫而書。

¹⁴由各字的間距與字形的大小可以判斷其抄寫的先後，《語叢一》第六五簡：「上下皆得其所之謂信」的「謂信」二字緊接而「信」字較小，顯然「信」字是補寫的；《語叢二》第四五簡：「未有善事人而不返者」的「返者」二字緊接而「者」字較小，「者」字顯然也是後來補寫的。

¹⁵《晉書·武帝紀》載汲冢竹書的字體也說是「古文篆書」，但今本《晉書》出於唐人之手，當時篆書已非日常實用的字體，所謂「古文篆書」云云，重點只在「古文」，至於「篆書」二字當是「連類及之」。

就是兩漢魏晉人所說的「科斗文」；若再參雜「鳥蟲書」筆意，形成「豐中首尾銳」的筆畫，則為《魏三體石經》「古文」一體之所從出了。《左傳》自先秦以訖西漢晚期湮而未彰，傳習者不多，未經輾轉抄寫，有幸保存先秦古抄本的原始面貌，而為東漢服虔所摩挲目驗；「古文篆書」一語正透露出個中消息。

服虔當年所見既是《左傳》的先秦古抄本，我們還應當注意，即無論《左傳》是否依傍《春秋》，是否原名《左氏春秋》，就先秦儒家典籍的分類而言，《春秋》為經典、《左傳》為傳注乃是不爭的事實。《語叢》類三篇的形式特徵既然與《左傳》的先秦古抄本完全吻合，則《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也當如《左傳》一般，屬於儒家典籍的「傳注」類。就簡長來說，這三篇最短，合於兩漢學者所述儒家典籍以簡長區分經、傳的標準；就篇章結構來說，這三篇片段成文，自為起訖，前後不相連屬而各有所指，正符合先秦時代傳注別出單行的體例；就內容來說，這三篇針對出現於《五行》等篇的若干語詞加以解釋或闡發，用語雷同，思想一致，顯然就是《五行》、《性自命出》等篇的注解。¹⁶總之，綜觀形式與內容，《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應當就是子思學派的後學所記錄的師說。其中引述《論語》的話，年代似乎較早，可能是「子思之言，而門人記之」；至於「擴充四端」的相關字句，估計出於孟子之後，為孟子的弟子所記。這批先秦儒家的經典與注解，隨著儒學的南傳來到了楚國，這也就是郭店竹簡儒家類古書年代的下限。

此外，還應當指出，《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有若干簡文的字體與楚國相去較遠。如果採取宏觀的角度，對照戰國青銅器銘文，如齊國的《陳曼簠》、《陳純釜》，三晉的《吉日壬午劍》、《魚鼎匕》，中山國的《中山王錯鼎》、《中山王錯壺》等，並與《魏三體石經》的「古文」相比較，我們可以說，《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具有齊、三晉、中山等國文字的特徵，而這一帶正是戰國儒家思想盛行的區域。《語叢一》、《語叢二》、《語叢三》自外地輾轉傳入楚國，簡文保存若干齊、魯

¹⁶ 例如《語叢一》第六八簡：「察天道以化民氣。」、第八四簡：「有察善，無為善。」、第八五簡：「察所知，察所不知。」、第八六簡：「勢與聲為可察也。」都是《五行》第八簡：「思不清不察」的「察」字的注解。

儒家經典的特色是可以理解的。這不但具體反映先秦時代儒家思想自齊、魯向四方傳播的過程，也客觀呈現了楚國與各國學術交流的實況。¹⁷尤其《語叢三》第二十四簡以下，筆勢圓轉流暢，筆觸輕重變化顯著，與《魏三體石經》的「古文」最覺神似；且其中屢次出現的「者」字完全不同於楚國以及三晉的形體結構，而與齊國文字一脈相承，其訛變、遞嬗之跡斑斑可考。¹⁸凡此均足以證明，這一類的字體保存了較多齊、魯儒家經典文字的特色。

《唐虞之道》與《忠信之道》的字體也值得注意。這兩篇簡文筆畫較肥，「豐中首尾銳」或「頭粗尾細」的特徵更為顯著，其中「仁」、「而」、「皇」、「情」、「皆」、「用」、「甚」、「者」等字的結構具有齊國文字的特徵，與楚國簡帛文字的風格迥然有別。估計其底本出自齊國儒家學者之手，傳入楚國為時不久，未經輾轉傳抄，保留較多的齊國文字的原貌。

總結的說，郭店竹簡儒家類古籍以子思的學說為主，雜有孟子之學的色彩，是先秦儒家由子思遞傳至孟子的第一手資料。本文指出經典與傳注之分，不但勾勒出儒家經典的成立與傳注形成的過程，更明白呈現孟子對子思之學的繼承、發展與改變。

¹⁷ 儒家典籍在流布的過程中不斷被傳習者輾轉抄寫，而時空的遷移也在文本烙下清晰的印痕。尤其楚國為南方之強，其語言、文化自成一系，不但與中原各國爭霸，甚至問鼎周室，儼然與天子分庭抗禮。這樣一個南方的大國，自國外引進學術思想，在傳抄外來典籍的過程中，勢必經歷文字「馴化」(Domestication)的階段。較早傳入的典籍，其字體早已「居楚則楚」，被楚國文字所馴化；至於新近傳入或罕為人知的文本，則往往保留若干外來文字的蛛絲馬跡。

¹⁸ 「者」字見於第二十六簡、第二十八簡、第三十簡。這種寫法是齊國文字的訛變，《陳純釜》銘文可以參看。另外，「於」、「親」等字則近似中山國器銘，而與楚簡常見的字體有別。

出席「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

心得報告

臺灣大學 周鳳五

- 一、會議名稱：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
- 二、日期：1999 年 10 月 15 日—18 日
- 三、地點：中國湖北省武漢市武漢大學
- 四、主辦單位：武漢大學、國際儒學聯合會、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
- 五、會議日程：
 - 10 月 14 日：報到
 - 10 月 15 日：開幕式。專題演講。分組討論（會議論文分為三個場地同時進行）。
 - 10 月 16 日：分組討論。宣讀論文《郭店楚墓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到湖北省博物館，參觀包山二號墓楚簡、曾侯乙墓竹簡等出土文物。
 - 10 月 17 日：分組討論。與北京大學李零教授、龐樸教授，武漢大學郭齊勇教授等共同主持綜合座談。閉幕式。
 - 10 月 18 日：到荊門市，參觀荊門博物館與郭店楚墓遺址。到荊州市，參觀荊州博物館藏郭店楚墓竹簡。返回武漢大學。
 - 10 月 19 日：到西安市。
- 六、心得報告：1998 年 5 月 22 日—26 日，就在《郭店楚墓竹簡》一書出版的同時，由艾蘭教授與韓祿伯教授主辦，在美國達慕斯大學召開第一次郭店竹簡國際學術研討會。一年半之後，國際漢學界對於這一主題的研究已經更為深入，同時也發掘出更多的問題，於是由武漢大學、國際儒學聯合會、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共同舉辦這次國際會議。在三天密集的日程中，不但得以接觸來自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的專家學者，比較他們不同的思考方向，學習由不同的角度切入問題；而且得以聆聽前輩學者如：香港中文大學饒

宗頤教授、北京大學任繼愈教授、裘錫圭教授、龐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李學勤教授等人的高論，掌握研究問題的基本方向。此外，大會期間抽空與同道好友李零教授、廖名春教授、劉釗教授、吳振武教授、黃錫全教授、郭齊勇教授、陳偉教授、徐少華教授、魏啓鵬教授、劉信芳教授、Dornald Harper 教授、池田知久教授等人，對於郭店竹簡若干疑難字的辨識與竹簡編連、內容理解等問題廣泛交換意見。又承李零教授提供尚未發表的上海博物館藏楚簡的相關資訊，對於深化研究工作，擴大研究成果都有莫大的幫助。至於三度參觀博物館，與當代一流學者親自目驗竹簡與出土隨葬器物，從而確認若干模糊的筆畫，解決簡文的考釋問題，更是此行重大的收穫。

赴大陸研習心得報告

中研院史語所 林素清

一

本人承蒙國科會補助，擔任協同主持人，執行專題研究計畫「郭店竹簡儒家類古籍研究」(NSC89-2411-H002-010)，為蒐集最近一年出土之第一手資料，並與大陸相關學術機構及學者交流切磋，掌握最新動態與研究趨勢，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五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前往湖北、湖南二省訪問。此次行程安排緊湊，成果十分豐碩，茲逐日敘述於後。

二

十二月五日：自中正機場搭機赴香港，與香港城市大學數學系客座教授程抱一先生會合，轉機至湖北省武漢市。程抱一教授研究中國古代數學史，此行專為目驗荊州博物館所藏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俾解決其中一個數學問題，遂約定同行，交換研究心得。

十二月六日：自武漢市乘車抵荆州市，由荊州博物館彭浩副館長陪同勘查楚國紀南城遺址與古墓群，遠眺包山二號墓，前往附近考古發掘現場，參觀左冢一號墓、二號墓、三號墓，並親自下坑，目睹漆器、青銅器等文物出土。器物均泡在泥水中，但基本完好。

十二月七日：在荊州博物館，參觀庫藏重要文物，如天星觀楚簡、王家臺秦簡、張家山漢簡等，與彭浩先生、程抱一教授商榷張家山漢簡的若干釋文與斷句問題，並與王明欽先生對王家臺秦簡若干文字的釋讀問題交換意見。

十二月八日：自荆州市乘車赴武昌，中午出席湖北省文化廳長午宴，會晤湖北省文博及考古學界相關學者與官員（如：湖北省博物館現任及二位前任館長、湖北省考古所所長、文化廳博物館處長等），就學術研究與兩岸交流問題交換意見。下午前往湖北省博物館與湖北省考古研究所，調閱庫藏包山二號墓竹簡與曾侯乙墓竹簡，仔細觀察曾侯乙編鐘銘文，並與劉信芳先生、王紅星先生、舒之梅先生等討論左冢二號墓出土漆器的性質並商榷漆器文字的釋讀。此器略似六博盤，但性質顯然不同，

或疑其爲占卜器，然無確證，文字亦尙待考釋。

十二月九日：上午，到書店買書。午後，由湖北省博物館研究員王紀潮先生陪同，自武漢市乘鐵路特快車赴襄樊市，傍晚抵達。會晤襄樊博物館館長葉植先生，詢知該館大致情況，共進晚餐。

十二月十日：上午，參觀三國諸葛亮「古隆中」遺址，多新建觀光景點。午後，轉赴米公祠（北宋書法家米芾紀念館）與夫人城（襄樊古城）遺址。最後參觀襄樊博物館，館藏青銅器不多，亦無精品。

十二月十一日：自襄樊市乘汽車經棗陽、唐縣赴隨州市。參觀隨州博物館，到庫房直接目驗孔家坡漢簡，這批竹簡尙未正式發表，目前由劉國勝與李天虹負責整理，據說已經寫好釋文，其中絕大部分爲日書。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到擂鼓墩曾侯乙墓博物館，由館長陪同參觀。該館係在曾侯乙墓發掘現場原地興建，完整保存考古發掘實況，頗富臨場感。又由館長陪同遠眺曾國墓葬群，平原之上，土冢累累，可見曾侯乙墓之外，未發掘的曾國墓葬爲數尙不少。下午乘車回武漢市，晚間抵達。

十二月十三日：清晨，赴武漢大學，參觀人文學院、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會晤郭齊勇教授、陳偉教授、徐少華教授等人。該校新近成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以研究出土文獻爲主，由國務院撥專款補助，圖書資料豐富，空間廣大，電腦設備齊全，整合該校文史哲相關教授與研究生，以齊頭並進的方式，分工合作，匯集研究成果，並廣邀校外專家學者來校訪問，提供研究心得，解決疑難問題，俾在短期內提升該校的研究水準。由於方法具體，態度積極，其前景未可限量。上午，應邀在該中心做學術講演，題目爲「郭店竹簡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發問者十分踴躍，歷時二小時半。下午，搭乘鐵路特快車赴湖南省長沙市，傍晚抵達。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由湖南省博物館副館長陳松長先生陪同，參觀該館所藏馬王堆漢墓文物，在庫房仔細觀覽馬王堆帛書，尤其有關《五行》部分，摩挲良久，對於經文與注解的關係頗有收穫。下午，出席該館舉辦的座談會，介紹臺灣重要的大學與學術機構，說明相關的研究概況。晚間，參觀長沙市博物館的編鐘、編磬演奏。

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參觀湖南大學與嶽麓書院。下午，由黃館長

陪同參觀長沙市博物館，該館所藏以商代青銅器及走馬樓三國吳簡爲主。前者若干器物體積特大，殷商時代長江以南有此重器，值得注意；後者新出土，目前仍在整理中。又參觀走馬樓三國吳簡整理工作隊，該隊擁有紅外線攝影機，傅隊長親自說明並示範整理簡牘的方法與工作流程，見其管理完善，效果十分良好，以有限的經費與人力，能獲得如此突出的成果，其苦幹實幹的精神令人佩服。

十二月十六日：中午，自長沙市搭機經香港返回臺北。

三

此行在十天之內，北抵襄樊，南至長沙，以兩湖地區楚文化遺址爲重點。所到之處均由專家陪同參觀，舉凡考古遺址、博物館、考古研究所、大學等均擇要造訪，會晤相關學者，交換研究心得。尤以親臨考古工地，目睹文物出土，與專家學者對第一手資料進行立即的考釋，不但增廣見聞，而且充分掌握臨場感，確屬難得的寶貴經驗。

出席國際會議報告

臺灣大學 周鳳五

中研院史語所 林素清

一、會議名稱：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日期：2000年8月18日-28日

三、會議性質：2000年8月19日至22日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是魯斯基金會和達慕思大學資助的兩個研討會中的第二個。第一個研討會由艾蘭、韓祿伯主辦，1998年5月22日至26日在達慕思大學舉行。會議討論的主題是：湖北郭店一號楚墓發現的楚簡《老子》。本次研討會由李學勤（中國社會科學院）、李伯謙（北京大學）主辦，在北京大學賽克勒博物館同時展出簡帛原件，並討論八個地點所出的新材料。

四、會議日程：

8月18日（星期五）

會議報到

參觀出土簡帛精品展覽

8月19日（星期六）

8:30-12:00 專題報告

主持人：李學勤

1. 艾蘭教授介紹會議緣起
2. 上海博物館馬承源先生介紹楚簡孔子《詩論》等

14:00-17:30 專題報告

主持人：李伯謙

3. 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張春龍先生介紹慈利楚簡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國定先生介紹新蔡楚簡

8月20日（星期日）

8:30-12:00 專題報告

主持人：安樂哲 (Roger T. Ames)

5. 湖北荊州博物館王明欽先生介紹王家台秦簡《歸藏》
6. 湖南省考古研究所郭偉民先生介紹虎溪山漢簡

14:00-17:30 專題報告

主持人：馬承源

7. 湖南省博物館陳松長先生介紹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所藏簡牘的內容與價值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郝本性先生、趙世綱先生，美國哈佛大學羅鳳鳴先生，達慕思大學魏克彬先生介紹溫縣盟書
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陳振裕先生、張昌平先生介紹湖北新出簡牘

8月21日 (星期一)

8:30-12:00

馬王堆漢墓帛書《式法》專題

主持人：譚朴森 (Paul Thompson)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李學勤先生

主講馬王堆漢墓帛書《式法》

討論

14:00-17:30

主持人：池田知久 (Tomohisa Ikeda)

討論

8月22日 (星期二)

8:30-12:00

郭店楚墓竹簡專題 (上)

主持人：裘錫圭

討論

14:30-16:00

郭店楚墓竹簡專題 (下)

主持人：艾蘭 (Sarah Allan)

討論

16:00-16:20

休息

16:20-17:30

綜合討論；會議總結

8月23日 (星期三)

出席清華大學所舉辦的「第二屆新出簡帛座談會」，由李學勤和艾蘭教授主持。參加者有：錢遜、廖名春、彭林、汪濤 (Wang Tao)、戴卡琳 (Carine Defoort)、安樂哲 (Roger T. Ames)、瓦格納 (Rudolph Wagner)、葉山 (Robin D.S. Yates)、何莫邪 (Christoph Hartsmeier)、譚朴森 (Paul

Thompson)、近藤浩之、周鳳五、林素清、丁原植、陳偉、郭齊勇、徐少華等。會中交換各國各大學關於簡帛研究概況及簡帛研讀班舉辦情形。林素清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設(一)漢簡研讀班(由文物圖象研究室主辦);(二)郭店楚簡研讀班(由林素清主持之本院主題計畫「楚簡綜合研究」負責);(三)本所新成立之「出土文獻研究室」之概況和舉行研討會情形。

8月24日(星期四)

上午由林素清、周鳳五主持「新出簡帛資料之研究與展望」之座談。參與學者有：彭浩、郭齊勇、徐少華、陳偉、劉信芳、陳松長等。

下午至文物研究所出席該所所舉辦之「簡帛文物之維護和整理」座談。介紹各國對文物的保護工作和援助計畫。出席者有：胡平生、李均明、張德芳、艾蘭、葉山、魏克彬、麥安迪、谷中信一、張光裕等。會中，林素清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對居延漢簡之整理和維護概況。

8月25日(星期五)

出席北京大學古籍研究所召開之兩岸文史研究所之課程和教學概況。參加者有：北京大學中文系之裘錫圭、李零、李家浩、沈培、董珊、陳劍；台灣大學周鳳五。會中，林素清報告中研院人才培育計畫，及歷史語言研究所「出土文獻研究室」所舉辦的研究生參與發表論文之「出土文獻學術研討會」之成果介紹。

8月26日(星期六)

周鳳五、林素清為執行本院「楚簡綜合研究計畫」，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座談，出席學者有：李家浩、李零、李若暉、邢文、王博、黃錫全、廖名春、彭林。

8月27日(星期日)

參觀訪問北京故宮博物院及中國歷史博物館。

8月28日(星期一)

搭機由北京經澳門轉返台北。結束這次行程。